

王独清生平考辨

李建中

王独清是创造社的著名诗人。三十年代以来，国民党政府即对其著述多次禁毁，遂使相关史料逐渐湮没不闻。近年以来，其在新诗创作上的贡献，日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。但是不少材料对其生平的叙述多有乖舛和不详之处，甚至相互袭用，以讹传讹。现就其荦荦大者，考辨如下：

一、生年籍贯

王独清生于公元1898年10月1日。其祖籍为陕西蒲城，但生于西安，长于西安。

王氏生年在其自叙传《长安城中的少年》一书中记述甚详。王氏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，是仲秋节后的第二天。换算为公历则为1898年10月1日。有的工具书定其生年为1895年，不确^①。

王氏的籍贯，长期以来各种材料都说长安人。其根据可能出自郭沫若《创造十年续篇》。该文说：“王独清和我们发生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，因为他们同是长安人，而且似乎还是同学。”^②后来，王独清的自叙传也以“长安城中的少年”自称。但是细读王氏该书，王独清的祖籍却是陕西蒲城。1992年5月，笔者前往蒲城考查，其族人至今仍在蒲城聚族而居。郭沫若说其是长安人，乃是沿用西安的旧称。实际上，长安乃是古都之名。明洪武二年已更名西安。但在民国文人的笔下仍沿用颇

具文化内涵的汉唐旧称——长安。解放后，因另设长安县，再继续沿用旧称，即易于混淆。

二、家世

王氏为蒲城望族。其先祖累世仕宦，且以忠烈闻名。其父为长安“名士”，其母出身卑微。

蒲城王氏的族谱至今尚存，从第一世至第二十一世（即王独清）记载甚全^③。其十八世，为王独清之曾祖辈，适值鸦片战争前后，其忠烈义举，名垂史典。其同宗曾祖王鼎，“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，授军机大臣”。时“英吉利兵犯沿海，鼎力主战”。后清室与英军议和，而抗英有功的林则徐却被谪戍新疆，“鼎愤甚，还朝争之力”。然而，道光帝拒谏不纳，命其休息养病。王鼎遂“自草遗疏”，“闭户自缢”，尸谏而亡。而且，在遗疏中力陈投降派穆彰阿误国之罪，一时震动朝野^④。同宗曾祖王增谦，其时任职广州。当英军即将进入广州之时，“运库金数千万入佛山，将集众与鏖”。给英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后来，议和之时，英军想借机报复，提出条件，“谓人曰：‘王某来，乃可议和’”。王增谦遂以必死为决心，“单骑怀匕首往”，与英军谈判^⑤。其嫡亲曾祖王益谦，长期在林则徐的故乡福建任职，历署蚶江、永春、侯官、政和、

将乐等邑，与林则徐交谊甚厚。王独清少年时还在家中见到林则徐遗赠的不少墨迹。当年，当外国传教士在建安以宗教煽惑群众之时，王益谦也曾严加制裁^⑥。所有这些都对王独清的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王独清之父名沆厚，虽为岁贡，然赋闲在家，耽溺文学，尤好楚辞，在长安城中过着“名士”生活。因辛亥革命时，陕西同盟会志士不少人为蒲城同乡，故王沆厚与其交往颇多。

王独清之生母杨氏，原籍浙江，身世不详，被人买卖，辗转入陕。杨氏原为王家侍女，后怀有身孕，遂被王沆厚纳之为妾，人称三姨太。杨氏聪颖美丽，入王家后，按主人要求读书习字，故能诵词曲，常以之为儿歌，教子诵读。杨氏身世不幸，性格沉思而忧郁。这对王独清性格的形成，似乎也不无影响。

三、早年经历

王独清幼年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，辛亥革命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。1918年东渡日本，1920年又赴欧洲，自学多种学科，后醉心艺术，并开始诗歌创作。

王独清虽为庶出，却是独子，在家中很是娇宠。他四岁发蒙，由其父亲自执教，课以经学。但王独清却喜爱文学和绘画，尤其醉心楚辞。1910年王独清之父和其生母先后病故，归葬蒲城。王独清时年仅十二岁。从此，他的优裕的少爷生活也就成了过去。

辛亥革命后，年幼的王独清由嫡母做主与李少媛成婚。李少媛之兄李天佐是留日学生、同盟会会员，劝说王独清的嫡母，征得她的同意，将王独清送入三秦公学就读，并出资供其所用。此后，王独清又进农业学校，后又改读法政，但均未毕业。

王独清少年早慧，九岁时便开始作诗，

十六岁已为西安各报投稿^⑦。后又被《秦镜报》聘为编辑负责人。《秦镜报》为陕西国民党机关报。其时，军阀陈树藩督陕，因报纸触犯当局，陈树藩派兵包围报馆，殴毙经理，王独清则脱身逃亡。《中国新诗库·王独清卷》说王独清逃亡出走，时年仅十四岁^⑧，与王独清之自述不相符合，显然文献失考。而且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少年即被聘为一家报纸的主编，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^⑨。《陕西五千年》一书中，介绍王独清的专稿《“落难公子”王独清》承袭此说，一并失考^⑩。

郑伯奇在1917年秋，前往日本自费留学^⑪。王独清于次年前往日本东京，投奔郑伯奇。郑伯奇回忆说：“在我到日本的第二年，王独清由我父亲带到上海，又独自搭船到横滨。我接他来东京同住。”^⑫在日本时，王独清开始接触外国文学，但最为喜爱的还是中国的古典诗歌，“特别爱好香艳体的诗词”，“他一天到晚哼着李义山、温飞卿以及《疑雨集》、《疑云集》等香艳体诗，而自我陶醉着。”^⑬王独清自己也说：“我甚至还曾经用了一种地方艺术的观点给李商隐注释过半部诗集”^⑭。由于对功课毫无兴趣，王独清没有希望考取学校，遂“在第三年的冬天，他一个人又提着他自己的破旧的行囊折回到上海来了。”^⑮这是1920年初的事。《中国新诗库·王独清卷》在谈及王独清从日本折回上海之事时说：“‘五四’之后，在日本帝国主义眼皮下，也难相容，三年过去，只好提着破旧行囊于1915年冬折回上海。”^⑯看来，其根据也是出自余慕陶的文章，但由于年代推算的错误，就出现了既在“五四”之后，又在1915年冬天这样的矛盾。

王独清从日本回到上海在留日学生办的《救国日报》做记者，并服务于中华工业协会，从事工会工作^⑰。在这不长的四个

月中，王独清“每天所写的文字都是社会运动的文字。当时中国是‘五四运动’的时期，我几乎把我整个的时间都用去参加实际的运动。”^⑧

1920年5月，在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中，王独清与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们一起乘 Armend Benic号邮船前往欧洲。王独清前往欧洲，是受中华工业协会的委托去组织其旅欧分会的，但因其内部矛盾重重而未果。1921年中华工业协会也因无人负责而自行消亡。《中国新诗库·王独清卷》说其1916年赴法，同样是年代推算上的错误。

王独清在上海时，即与《少年中国》学会的某些领导人相识。其初至法国时，即参加了《少年中国》学会主持的巴黎通讯社的工作。1920年11月《少年中国》上发表了王独清在旅欧途中所写的一首小诗。这是王独清在《少年中国》发表作品之始。《中国新诗库·王独清卷》将其在《少年中国》、《时事新报》的《学灯》撰文的时间，放在1916年间，又是时间推算上的错误。其实《少年中国》和《学灯》专栏的创办都在1918年以后了。

与王独清同船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们，不少人在蒙达儿公学学习。不久，王独清也到了蒙达儿，在此结识了向警予、蔡和森、蔡畅等人。王独清住在该城一个法国人的家中，埋头自然科学的研读和法文练习，并开始学习拉丁文。王独清在日本时即自学过生物学、解剖学、遗传学，这时又陆续自历史学、地理学、考古学，后又涉猎经济史、佛罗伊德心理学、美学、星象学、天体分光学。其间，还曾入法兰西学院听哲学讲座。最后又倾心于罗马和古希腊的艺术。王独清的自学，似乎是兴之所至，随其所往，这使他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近代文化。

从1922年起，王独清以法国为中心，

多次游历欧洲各国，先后至意大利、德意志、瑞士、比利时、英国、西班牙。王独清浪迹欧洲各地，与其生活困顿密切相关。当时，第一次大战之后的欧洲，经济萧条，谋生不易。他四处流浪，不过为求得一职。他曾经住在肮脏杂乱的巴黎的贫民区，寄住在别人室内的地板上。债务缠身，饥寒冻馁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他当过工人，充任园丁，服务于图书馆。这使他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，了解了现代文明的另一面。有些材料说他“家里很有钱，是个少爷公子，曾留学法国”^⑨，说他“赴法留学，专心研究艺术”^⑩，似乎王独清依靠家中的钱财，在法国过着优裕的生活，心无旁骛，潜心艺术和学业，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。其实，王独清在法国从来没有进过一所正式的学校。他曾经听过哲学讲座的法兰西学院，是一个国家研究机构，也是一所成人教育中心。这个学院既不授学位，也不发给证书；既不举行入学考试，也不收取学习费用；可以随时入学，也可以随时中辍。王独清也曾进入蒙达儿公学和里昂的中法大学，但不过是在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处寄居而已。生活的艰难始终没有离开过他，从日本到法国，说他是一个“落难公子”倒是庶几近之。

在欧洲，王独清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活。这时，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。咖啡馆里昏黄的灯光，哀婉的音乐；异国少女炽热的恋情，动人的身姿；罗马城中古代的废墟，精美的雕像，都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。他说：只有当他“浪游在欧洲的时候，这才真正把身子浸在了创作里面。”^⑪与此同时，他还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。其中既有欧洲古代诗人的作品，也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派的作品。而且在咖啡馆里，他结识了法国著名作家洛蒂（王氏译作罗狄），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法朗士。

四、与创造社的关系

王独清是创造社的早期成员，1926年从欧洲回国后，介入创造社的活动，曾任创造社监察委员，常务理事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在创造社“剧变”之时，主编《创造月刊》。直到1929年创造社因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而结束，王独清始终是创造社的成员。

1921年7月初，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的时候，由于郑伯奇的介绍，王独清成了创造社的早期成员。关于这件事，当事人之一的郑伯奇说：“王独清原是我的朋友，……因为他爱好文学，我想拉他参加创造社，把创造社出版刊物的消息告诉了他，他就从法国寄来厚厚两部长稿，希望发表或出版，借此和创造社取得联系，并想得点稿费，维持生活。”^②这两部长稿，一部是长诗《支那》，另一部是泰戈儿《新月集》的译稿。前者郭沫若弃置未用，后者经其修改，列入《创造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》丛书印行。郑伯奇说：“王独清也因此成为创造社的成员，给他以后在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上造成了有利条件。”^③郭沫若在《创造十年续篇》中的回忆和王独清在《我在欧洲的生活》中的自述，也都共同肯定了这个事实。只是王独清不知《支那》如何被弃，而为此深感遗憾。因此，说“王独清是创造社前后期之间加入创造社的”^④就不够确切了。至于说王独清从欧洲“回国后，与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”^⑤，那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。因为王独清从欧洲回国的时候，创造社已经成立好几年了。

王独清在欧洲的时候，其与创造社的联系主要是撰稿和通信。王独清介入创造社的各种活动是1926年回国之后的事。1925年的五卅运动激发了王独清的爱国热情，他决定近期回国。但由于筹措路费的耽延，他动身回国的时候已是1925年的年底

了。1926年2月，王独清在上海见到了相知已久但未曾谋面的郭沫若、郁达夫。这时，郭沫若受聘广东大学，担任文科院长。郭沫若约请郁达夫、王独清两人同往广东大学任教。于是三人于1926年3月18日一同离开上海，前往广州^⑥。在广东大学，王独清先任教授。7月，郭沫若参加了北伐后，王独清代理了文科院长^⑦。这时，创造社成员汇集广州，创造社总社遂选举了第一届执行委员。王独清任监察委员和出版部总部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，专负编辑之责^⑧。1927年1月鲁迅到达广州，不久出任中山大学(原广东大学)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1927年4月1日，王独清与鲁迅、成仿吾等人列名于《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》。“宣言”表示：“在这里签名的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。”呼吁英国的无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联合起来，与中国人民一道，共同进行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政变后，广州军阀也在4月15日发动了大屠杀。这时，王独清离开广州，途经香港，于5月1日到达上海^⑨。不久，王独清接替郁达夫主持《创造月刊》的编辑事务，从第一卷第七期(1927年7月15日出版)起，担任主编。

当时，创造社曾拟与鲁迅联合，复话《创造周报》。王独清与成仿吾、郑伯奇、段可情任编辑委员，鲁迅、郭沫若(麦克昂)等任特约撰述员。1927年12月3日《时事新报》即报导了此事。但是后来合作夭折，未成事实。

1928年，创造社发生“剧变”，开始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，史称“后期创造社”。《创造月刊》第一卷第八期(1928年1月1日出版)发表了郭沫若的《英雄树》，第一卷第九期(1928年2月1日出版)发表了成仿

吾的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》。王独清在这期编辑后记《今后的本刊》中向读者推荐了成仿吾的这篇文章，而且说，这“简直可以说是今后同人要从事于新努力的一篇宣言”。王独清在《创造月刊》第一卷第十期（1928年3月）之后，交卸了主编之职。该刊在由成仿吾主编了第一卷第十一期之后，从第一卷第十二期（1928年5月）开始，则由新组成的文学部集体主持编辑事务了。然而，王独清仍继续在《创造月刊》以及创造社的其它刊物上发表文章，并为公开提出“Proletorian艺术”（按：即普罗列塔利亚艺术）的《创造月刊》第二卷第一期写了“卷首语”——《新的开场》。在该刊第二卷第六期（即终刊号，1929年1月）还发表了历史小说《子畏于匡》。该期在第七期的要目预告中，也还列有王独清的小说《信仰》。

在此期间，1928年2月，王独清担任了上海艺术大学的委员，后又出任教务长。上海艺术大学的主办人是周豪勤。周氏原拟请郁达夫主持校务，但郁考虑到“没有经济上的后援，坚决辞去”^⑩。不久，郁达夫即声明脱离创造社。以后，周豪勤即将目标转至王独清。王独清担任该校之职以后，蛰居上海的郭沫若还曾就此事征求创造社同人的意见。当时，郭氏不同意王独清就任此职，但是成仿吾、郑伯奇、彭康、朱镜我，冯乃超等皆表赞同^⑪。后来，冯乃超还担任了该校的社会科学系主任^⑫，郑伯奇、沈起予等也都在该校任教。当时，上海艺术大学成了著名的“赤化学学校”，培养了不少追求进步的学生。

1929年2月7日，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查封，刚刚出版不久的《创造月刊》第二卷第六期，即成了该刊的终刊号。一般认为这即是创造社的结束。这时，郁达夫早已退出创造社，郭沫若也于1928年2月离

沪东渡，成仿吾于同年5月经日本前往巴黎，张资平则于同年9月自办乐群书店另谋发展。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，已经结束了。事隔多年之后，郭沫若在谈及这段历史的时候说：“1929年2月7日，创造社被国民党封闭了，也可以说结束了它的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任务。”^⑬郑伯奇也说：“当创造社遭受封闭的时候，它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”^⑭而在创造社被封闭亦即其结束之前，王独清始终参与着创造社的文学活动。甚至到1929年10月，王独清仍在前创造社同人所办的江南书店出版了他的剧本《貂蝉》。可见王独清与创造社的关系是贯彻始终的。因此，以为王独清因托派问题而“被清除出创造社”^⑮显然与历史不相附合。至于以为1928年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，王独清因“政治转向”而“退出”创造社，那就离事实更远了^⑯。

五、托派问题

王独清在三十年代初加入托派的统一组织。这时创造社已经结束。王独清主编的《展开》已属托派立场，但不应将其与主张民族主义文学的《开展》相混同。王独清成为托派后，其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停止。王独清的文学成就，主要在创造社时期，与托派无涉。

王独清没有因加入托派组织而被清除出创造社或脱离、退出创造社，其最基本的原因是创造社存在之时，中国还没有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托派组织。王独清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员，自然不可能在此时成为托派成员。

中国的托派在形成之初有四个小组织。与王独清关系密切的是以陈独秀为首的“无产者社”这一派。这一个托派小组织形成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：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，陈独秀对未来的中国革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看法。1929年4、5

月间，又逐渐接受了托洛斯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。8月5日，陈独秀致书中共中央，以托洛斯基主义的立场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观点，猛烈抨击“八七”会议和“六大”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。9月，陈独秀在党内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，取名“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”。10月5日，中共中央做出《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》。11月15日，又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、汪泽楷、马玉夫、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》。12月，陈独秀联合81人，通过了“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”的纲领——《我们的政治意见书》，抨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，并要求恢复被开除者的党籍。1930年3月，陈独秀等《我们的政治意见书》公开散发，并出刊其机关报《无产者》，这一托派组织遂在党外独立开始活动。托派本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，其成员不仅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而且“无产者”社中许多人都是党内的著名人物，因之托派中人将其称为“元老派”。有人说：“1928年至1929年间，陈独秀的托派组织，王独清也参加了，成了托派的宣传部长。”^⑩显然记忆失误。王独清作为一个非党人士，在托派还是一个党内反对派时，即加入托派组织，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。而且陈独秀形成托派观点并成立相应的组织，这时创造社已经结束，自然也不可能有“开除”或“退出”之举了。

王独清如何参加托派，郑超麟对此事了解甚详。王独清与郑超麟在1928年4、5月间相识。那时中共中央派郑超麟去同创造社联系，以从政治上影响创造社。王独清从他在法国蒙达尔公学时认识的蔡畅处知道了此事，便单独约见郑超麟。此后，两人来往密切。郑超麟说：“我和他密

切来往时，中国还没有托派，我自己还不是托派。一九三一年，我被国民党逮捕前，他因同我往来（那时我们是托派了），受到了创造社朋友的攻击，但他并不后退。其实，他那时还没有参加托派组织。”^⑪1991年11月1日，郑超麟在给笔者的复信中再次明确地说：“王独清从来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也没有加入所谓‘无产者社’（即是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小组织），不过同我们做朋友往来。我一九三一年五月被国民党逮捕时，王独清尚未参加托派组织。我出狱后才知道他参加了组织，但不是参加‘无产者社’（那时已没有‘无产者社’），而是参加了统一的托派组织。”托派统一组织成立于1931年5月。不久，郑超麟等人即被捕。1932年9月，陈独秀又被捕，托派组织主要成员相继入狱，其组织遂陷入瘫痪。估计，王独清参加托派即在1931年5月至1932年9月这一段时间之内。有的研究者对王独清是否参加托派持怀疑态度，也是缺乏根据的。

1930年9月，王独清主编的《展开》月刊出版。因为名称的相似，不少材料将《展开》和《开展》混为一谈，将《开展》误记在王独清的名下。《展开》于1930年9月在上海创刊，由王独清主编，后被国民党当局禁止。《开展》于1930年8月在南京创刊，由开展文艺社主编。这是一个鼓吹民族主义文学的半官方刊物。今天，在很难看见原件的条件下，因误读而产生混淆是难以避免的，甚至连新近编辑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（1927—1937）第十九卷（史料·索引一）的作者小传和大事记中的有关文字，也将二者混淆起来，将《开展》误记在王独清的名下。不过，该书同卷收录了《〈开展〉第三号编辑后记》一文。这篇文章就是当年《开展》社专为申明二者之不同而撰写的。《展开》和《开展》之不同，一读此文，

便知分晓。

《展开》出版之时，王独清尚未加入托派组织。但因与托派中人交谊甚密，已接受了托派影响。香港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其著作中指出，《展开》已属“托派立场”。^⑨

六、后期活动

王独清成为托派后，与左翼文坛的联系逐渐断绝，后从事历史资料的整理，并在托派的刊物上发表有关文学方面的文章。

虽然托派组织已从中国共产党内分裂出去，但在三十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国民党政府仍然将其看作政治上的反对派，甚至看成共产党，对其进行镇压，王独清的著作也一再受到禁止；再加上王独清在创造社时期所形成的较大影响，因此，王独清虽然受到不少左翼人士的鄙弃，但其与左翼文坛的联系尚未完全断绝。如参加左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，接受《文艺新闻》社的采访，为左联青年所办的一些刊物写稿，与左联中的文学青年也有一定的文字交往。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“围剿”和反“围剿”的斗争非常激烈。王独清处在左、右夹击之中，在文学界的活动越来越少。三十年代中期之后，竟至销声匿迹，完全沉默。1936年后，他参与了“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”的辑录和整理，为其主编之一。王独清辑录整理的计有《先拨志始》、《庚子国变记》、《东南纪事》等。书前均有王独清所作之序言。在序言中，他颂扬明末农民起义，揭露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并借古讽今抨击国民党政府亲日卖国的投降政策。这套丛书解放后曾以“中国历史资料丛书”之名，两次印行。王独清所写之序，除《东南纪事》外，其余两书均全文保留，不过署名却已删去王独清之名而改为编者。上

海“孤岛”时期，王独清则以“野老”为笔名，曾在托派的公开刊物《动向》、《破晓》等刊物上写过文学方面的文章，如《罗曼·罗兰新论》、《罗曼·罗兰新论的申论》等。

王独清离开家乡后，就与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。从欧洲回国后，王独清声名渐著。三十年代初，其堂弟从家乡来信，约其返乡。王独清踌躇再三，终不果行^⑩。后李少媛曾寻至上海，王独清避而不见，李氏遂返回陕西，终身独居，七十年代初卒于西安^⑪。1931年，王独清与黄碧遥相恋结婚。黄碧遥，湖南资兴人，是创造社女作家白薇（黄碧珠）之妹。黄氏原夫去世时，留有一子，与王独清结婚后，未有子嗣^⑫。黄氏当年曾有戏剧集《去留》一种，1936年由上海新钟书局收入“新钟创作丛书”第一集出版发行。

王独清于1940年夏，因伤寒症病逝于上海。司马长风《中国新文学史》早已说明，王独清于抗战后滞留上海，并于1940年病歿上海^⑬。然《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》，《中国现代文学手册》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），未之深考，说王独清于抗战后回到故乡，病逝于西安，皆不确。

七、文学著述

王独清的文字生涯开始得很早，他正式从事文学创作则是到法国留学，特别是参加创造社之后。其主要作品都写作于创造社时期，沦为托派后，诗作甚少。终其一生文学著述，计有：

（一）诗歌

《圣母像前》 1926年光华书局出版。1927年改版后，归创造社出版部出版，为“创造社丛书”之一；

《死前》 1927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，为“创造社丛书”之一；

《威尼市》 1929年江南书店出版；

《埃及人》 1929年上海世纪书局出版；

*《独清诗集》（按，此为以上四种诗集的合集） 1930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；

*《11DEC》（按，即英文十二月十一日） 1928年出版，无版权页。不少资料误排为“HDEC”或“Lidec”。

*《锻炼》 1932年光华书局出版。1934年被禁；

《零乱章》 1933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。

（二）戏剧

*《杨贵妃之死》 1927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，为“创造社丛书”之一；

《貂蝉》 1929年江南书店出版。

（三）短篇小说

*《暗云》 1931年光明书局出版。1934年被禁。（按，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在介绍王氏著作时，在《暗云》后列有《短篇小说》一种，挪用该书的一些资料也沿用不爽。疑《短篇小说》者或为《短篇小说》的误排，即将说明《暗云》体裁的括弧误排为书名号。王氏不善小说，《暗云》仅收作品三篇，而且水准并不很高。）

（四）杂文、杂论

*《前后》 1928年上海世纪书局出版。（按，王氏此书共分两部分。“前：信札七篇”，“后：讲演五篇”，故以《前后》名之。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误排为《前书》，不少资料亦因沿用而致误。）

*《独清文艺论集》 1932年光华书局出版。1934年被禁；

《如此》 1936年新钟书局出版，为“新钟创作丛书”第一辑之一；

《独清三种》 1934年上海长安出版部印行，无版权页。

（五）翻译

泰戈尔《新月集》 1923年泰东书局出

版，为创造社“世界少年文学选集”丛书之一；

*《独清译诗集》 1929年现代书局出版；

但丁《新生》 1934年光明书局出版。

（六）自叙传

《我在欧洲的生活》 1932年光华书局出版。1934年被禁。

《长安城中的少年》 1933年光明书局出版。

（七）选集

《独清诗选》 1928年新宇宙书店出版；

《独清自选集》 1933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。1934年被禁。1968年上海书店据乐华版复印发行；

*《王独清诗歌代表作》 193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；

*《王独清选集》 1936年上海万象书屋出版，为“现代创作文库”之一；

*《独清创作选》 1936年上海仿古书店出版，为“现代名人创作丛书”之一。

以上著述除文中说明解放后印行者外，早已绝版。而且，除书名前标有*号者，新近出版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（1927—1937）之《史料·索引》专卷也未曾著录，阙失尚多。另，有些资料在王氏著述中列有《中国文学运动史》一种，疑此为《中国文化运动史》之误植。这是三十年代初，王独清拟议中之著述，此后似未见出版印行。

1993年春

附注：关于王独清生平不确之异说，散见多种书籍，拙文论列仅数种而已。其余则因其相互袭用，文繁不录。拙文所述王独清生平史料，凡出自《长安城中的少年》、《我在欧洲的生活》二书者，亦不再一一注明。

① 见《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》“王独清”词条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。

- ②⑥ 见《沫若文集》第七卷第267页，267—27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。
- ③ 王氏族谱存蒲城县志办资料室。
- ④ 见《清史稿》列传一百五十卷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三十八册第11415页。
- ⑤⑥ 王增谦、王益谦事，皆见清刻本《蒲城县志》。
- ⑦⑧⑨ 见《独清自选集·我文学生活的回顾》，乐华图书公司一九三三年版。
- ⑩⑪ 见该书“卷首”第1页，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。
- ⑫ 王独清在《我在欧洲的生活》一书中，追述其这段生活时，说其十三岁即开始为西安各报投稿，十六岁被聘为《秦镜报》主编。这虽与《我文学生活的回顾》一文中所说，略有不同，但均在十四岁之后，此意甚明。
- ⑬ 见该书第728页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。
- ⑭ 见徐州师范学院编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·郑伯奇传略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- ⑮⑯⑰⑱ 见《郑伯奇文集》第1305页，第1306页，第1314页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- ⑲ 《独清自选集》第185页，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版。
- ⑳ 见区梦觉编《王独清论》中所收的余蔡陶所撰的同名文章，光华书局1933年版。
- ㉑ 王独清《如此·自述》，新钟书局1936年版。
- ㉒⑳㉔㉖ 《成仿吾文集》第293页，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- ㉗㉙㉚ 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(现代第一分册)第56页，第57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
- ㉛㉜ 《郑伯奇文集》第1241页。
- ㉝㉞ 《郁达夫日记·五月日记》，《郁达夫日记·新生日记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
- ㉟ 《洪水》(半月刊)《洪水周年增刊》1926年创造社出版部。
- ㊱ 见《沫若文集》第八卷《离沪之前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- ㊲ 楼适夷：《怀乃超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6年第3期。
- ㊳ 单演义等编：《鲁迅与郭沫若》第216页，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1979年印行。
- ㊴ 唐弢：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》第190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
- ㊵ 《郑超麟谈王独清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91年第1期。
- ㊶ 《中国新文学史》中册，第26页，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。
- ㊷ 区梦觉编《王独清论·王独清素描》。
- ㊸ 新编《蒲城县志》初稿，未刊行。
- ㊹ 1992、1、10、郑超麟给笔者的信。
- ㊺ 参见该书下册第10页，第58页。

